

日本国会图书馆藏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 成书时代考

吴 羽

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册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，抄本，内容涉及人们出行、修造、婚姻、安葬、立契、买卖的时间避忌，其中关于修造时间避忌的内容最多。黄正建先生率先在国内作了报道，引用《十国春秋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中关于《百忌历》的记载，指出《百忌历》在晚唐五代非常流行，认为这应该就是吕才编的、著录在史志上的《广济阴阳百忌历》，而且发现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的内容有很多与敦煌占卜书的内容很近似^①。

循着黄先生提供的线索，在酒井规史博士的帮助下，笔者看到了此书，该书由“长短二星”、“赤口杀”、“万通历”、“白虎历日之图”、“天休厌日”、“天文废日”、“四季废日”、“行年身黑方忌造作”、“五星灭会”、“逐年伏兵大祸三刑五败方”、“破败五鬼”、“定生死气”、“库楼歌”、“推天罡河魁日”、“新添起屋作土忌天命煞”、“新添宅地十八形势吉凶之图”、“推九宫鬼煞临人运命方所”、“新添反激日”、“占鸦鸣经”、“五逆六不祥法”、“土箭神逐日临方”、“土皇游方”、“推本命冲破年”、“本宫命入天宫年”、“本命所属五煞”、“吟神三煞图”、“生死甲日”、“金神七煞图”、“逐旬生甲日”、“推九宫鬼煞临人运命方所”等内容组成。篇幅不大，内容丰富，间有重复，是该书流行期间多种避忌理论的集录，并无一以贯之的理论，其中不少内容见于元明通书。而据黄正建先生的研究，晚唐五代两宋，《百忌历》均曾流行，我们提出的问题是，《百忌历》的内容是不是一成不变？假如《百忌历》的内容在随时代的推移而增删内容，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的这册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应该是何时成书？笔者拟从其中所载的一些重要内容入手，对其成书年代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。黄正建先生已经考察过的内容，本文不再赘述。

^①黄正建：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》，学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44-245页。

一、长、短二星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有长、短二星。长、短二星是宋元通书中重要的神煞,据元宋鲁珍编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载,所直之日忌市买、交易、裁衣、纳财^①。长短星信仰流行于什么时间呢?

迄今尚未见到唐代文献中记载长、短星的避忌,目前所知,较早出现对长、短星忌讳是在南唐,《白孔六帖》卷四十二“出入辜平”条引《野史》云“南唐曹随知卢陵吉阳令。先是,邑有二胥酋,辨于治体,亦精于法律,惟能出入辜平,时邑民苦之,谓之长、短星。”^②可是尚不清楚这里的长短星是否和百忌历中的长、短星完全一样。北宋中期已经有长、短星所直之日的确切记载,黄庭坚《长短星歌》云:

正月虎,七泽阴风无避处。少年射杀白额归,二十一岁赐旗鼓。

二月兔,翰墨功名归四杜。中山毛遂定从还,十九上客谁复数。

三月龙,定力降来一钵中。升腾便欲致云雨,十六开士观云风。

四月蛇,九蛇相辅成晋家。屈原《离骚》二十五,不及之推死怨嗟。

五月马,十五《国风》多咏写。汉将西极天马来,二十五城不当价。

六月羊,十岁小儿牧道傍。他年叱石金华路,二十年前身姓黄。

七月猴,恒山八命列封侯。当年传国一十二^③,想是衣冠骑土牛。

八月鸡,二妙灵台向晓啼。五更风雨十八九,残月昏昏信可期。

九月狗,三窟深坑四荒走。暮归得免十六七,黄卢朱雀皆在后。

十月猪,白头一笑献士夫。杀身愿为鲁津伯,申封兰王十四都。

十一月鼠,列十二辰配龙虎。二十二年看仙飞,一朝化作蝙蝠去。

十二月牛,百户椎肥醉九州。角端围寸二十五,良弓之材牛带牛。^④

将其中每月提到的数字变成日,即正月七、二十一日,二月四、十九日,三月一、十六日,四月九、二十五日,五月十五、二十五日,六月十、二十日,七月八、十二日,八月二、十八、十九日,九月三、四、十六、十七日,十月一、十四日,十一月十二、二十二,十二月九、二十五日。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六月为二十一,八月多出初五;七月为二十二,其他完全相同。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则三月多出十一(短星),五月为十一、二十五,八月多出初五(同《通书》),七月为八、二十三,九月无十六、十七,十一月为十一、二十二,十二月为初五、廿五、初九在道,基本相同,不同之处当系传抄讹误。

敦煌五代宋初历日中尚未标注长、短星所在之日,《大宋宝祐四年丙辰岁会天万年具注历》中一些日已经标注了长、短星,例如四月二十五丙戌土执星,

①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1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,第810页。

②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91册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年,第667页。

③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《山谷别集》卷六为“二十二”。

④《黄庭坚全集》第3册,四川大学出版社,2001年,第1681-1682页。

旁注有短星；六月九日戊辰木收虚，旁注有长星，虽然按照前揭诸史料，此处不应注在九日，而应注在十日，但是表明当时历日确实已经注长、短星。

当然，我们不能说长、短星观念最初形成于五代十国时期，但是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，将之推定在晚唐五代，应该问题不大，而在北宋中期，该信仰已经非常流行，以至于黄庭坚以之为题作诗，至迟在南宋宝祐四年（1256）这种信仰已经被国家承认，正式编入了历日。

二、赤口杀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有赤口杀。《钦定协纪辨方书》卷三十六“上兀、下兀”条云：

宋王明清《谈录》载，丁顾言宦蜀，至官有期，驻舟江浒，游憩山寺，遇老僧，问：“何为而至？”丁具以告。又问：“期在何时？”丁又以告。僧曰：“是取为兀日，不可视事，勿避之，君必以事去。”丁笑而不应。既至官月余，以事免归。是兀日之说自宋已有之矣，顾详其取义，不过小六壬之留连、赤口日耳。阳年正月初一日起小吉，阴年正月初一日起留连。按日顺数，毫无深义，然则宋时老僧亦偶中耳。^①

按，《钦定协纪辨方书》云王明清《谈录》，有误，丁顾言事实际出自王钦臣所撰《王氏谈录》“上官忌兀日”条，该书主要记录卒于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的王洙之言^②。据此则兀日之说在仁宗年间已经在四川有一定影响。然《王氏谈录》此条过简，看不出其中“兀日”之说是否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所载赤口杀相同，因此尚需其他材料进一步证明。

元宋鲁珍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前集卷一“论上兀、下兀日”条云：

盖兀者，蹉跎不安之义，参详古历，初无兀日，至宋朝始有邪经，所谓《六轮兀》、《本命兀》、《九官兀》、《月兀》、《京兀》、《传神兀》、《坎离兀》、《九元兀》、《顺逆兀》、《秘要兀》、《五位兀》、《大小月兀》、《寅午戌兀》、《十二官兀》，凡二三十家，皆穿凿不经，惟《六轮兀》乃沈学士存中在翰林修元丰历；阁下寻出，用之有验，今世上官以为凶日，犹忌其日。^③

按，宋无“元丰历”，但沈括确曾参与修历，《宋史》卷十五载熙宁八年四月“壬寅，沈括上《奉元历》”，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所云“元丰历”，当为《奉元历》之讹，本材料基本可信。

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前集卷一根据沈括的《六轮兀》制成了阳年上下兀、阴年上下兀日的表格。其中阴年的下兀日分布情况是：正、七月，初三、初九、十五、廿一、廿七；二、八月，初二、初八、十四、二十、廿六；三、九月，初一、初

①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11册，第1015页。

②王钦臣：《王氏谈录》，朱易安、傅璇琮等主编：《全宋笔记》第一编第十册，大象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71页。

③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1册，第647页。

七、十三、十九、廿五；四、十月，初六、十二、十八、廿四、三十；五、十一月，初五、十一、十七、廿三、廿九；六、十二月，初四、初十、十六、廿二、廿八，与同书同卷所载赤口杀日同^①。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所载赤口杀日除二、八月为“初二、初八、十四、廿二、廿七”与《新刊阴阳宝鉴尅择通书》略有不同之外，其他完全相同，当系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所抄有误。

综合《王氏谈录》和《新刊阴阳宝鉴尅择通书》的记载，赤口杀之说行世当在北宋时期。

三、《万通历》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有《万通历》，称“系从三元中一十八家阴阳经内删出”，其中的受死日是凶日，不可用，可惜不知何故，本抄本未标出受死日。目前所知，最完整保存《万通历》的是宋代的《三历撮要》，其文云：

《万通历》者，系三元中删出，又名《总天大卦》。更不论年、月、使日，及不忌诸杂忌讳，只不得用受死日。如遇吉星，五音造作、嫁娶、开门、放水、塞穴、建库、立仓、求财、交易、埋葬、祀神、临官、赴任、出兵、动土、兴工、行船、出路等并吉。凡遇吉庆、幽微、满德、活耀大吉，其下逢黑圈者最吉，逢白字乃受死日，不可用。余八星，凶星也，其下逢白字，亦是受死日，逢之所谓凶而又凶也。凡用此凶、吉日，六旬或百二十日立见祸福，亦有诀例，不甚捷要，今具图于后。^②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所述与之基本相合，一些地方比之稍详，比如《三历撮要》云“不忌诸杂忌讳”，而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则具体列举了“太岁、三煞、长短星、空亡、十二大贬（笔者按：当为败）、九空、四废”等杂忌的名称。从《三历撮要》描述来看，《万通历》由叙述吉、凶星的理论和相关“诀例”组成，是一种单独成书，对其他择日理论具有排斥性的简便手册。《三历撮要》中的《万通历》是经过精简的形态。现将《三历撮要》中的《〈万通历〉吉凶日图诀》整理如下：

	杀星	祸星	玄加	吉庆	凶星	幽微	死气	天劫	满德	神后	口舌	活耀
正	午	未	申	酉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
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
三	申	酉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
四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	亥	子
五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
六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	亥	子	丑	寅
七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	亥

①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1册，第646、645页。

②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1册，第54页。

八	巳	午	☰	申	酉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
九	☷	卯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	亥	子	丑
十	未	☷	酉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
十一	辰	巳	午	未	申	酉	戌	亥	子	丑	寅	☷
十二	☷	戌	亥	子	丑	寅	卯	辰	巳	午	未	申

该表除“口舌”之八月与十二月、“活耀”之八至十二月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有所不同之外,其他完全相同,而从上表可以看出每月诸吉凶日均是按照十二地支排列,惟起始地支不同,故而吉凶日各别,八至十二月十二地支顺序未见异常,而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则出现异常,故当系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传抄错误。从上表可以明显看出,正月至十二月的受死日依次是,戌、辰、亥、巳、子、午、丑、未、寅、申、卯、酉,成为被后世通书广泛接受的凶日,例如,《新刊阴阳宝鉴剋择通书》前集卷三“出行远回”诸凶日中便有受死日^①,丘延翰《万历会同》也避免受死日^②,其例甚多,不再一一列举。

《万通历》成书于何时?宋仁宗康定年间曾公亮等编《武经总要》后集卷二十“择岁月时法”记载:“凡受死日凶,正戌、二辰、三亥、四巳、五子、六午、七丑、八未、九寅、十申、十一卯、十二酉。”正好与《万通历》受死日同,这是目前所知较早的关于受死日的记载,由于唐代传世文献中不见此书的著录及遗文,我们倾向于认为,《万通历》应是五代末宋初才出现的著作。

四、《占鸦鸣经》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有《占鸦鸣经》,黄正建先生指出与 P.3479 号敦煌文书所载“乌占习要事法”内容有相似之处,其言甚确。然而两者占法也有重要不同,《占鸦鸣经》是按照正东、东南、正南、西南、正西、西北、正北、东北八个方位方来排列,每方位排列寅卯、辰巳、午、未申、酉五个时间段的鸦鸣吉凶,而戌、亥、子、丑四个时辰不占。“乌占习要事法”也是八方,但是文书现存“东方署”直至“黄昏时”十个时间,鸦鸣所主吉凶用语基本不同,因此两书关系比较疏远。宋代俞海《百怪断经》中有《鸦鸣占》,其文曰:

寅卯时:正东送物、东南争、正南吉、西南吉、正西外人思、西北酒食、正北口舌、东北病。

辰巳时:正东风雨、东南女客、正南相命、西南争、正西官讼、西北贵人至、正北相命、东北亲至。

午时:正东争、东南亲客、正南争、西南不宁、正西送物、西北酒食、正北六畜至、东北送物。

未申时:正东凶、东南凶信、正南远信、西南大雨、正西吉、西北亲客、

①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 1061 册,第 717 页。

②《永乐大典》第 8 册,中华书局,1986 年,第 7524 页。

正北失物在、东北客至。

酉时：正东公事、东南外服、正南故人、西南相召、正西客至、西北失物、正北病、东北客至。……若在百步之外，不必听也。^①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，辰巳时，西南为“人相命”，正西为“内斗争”，正北为“亲人至”；午时，西南“主至”，西北无占卜内容，东北“女家退物”；未申时，正南为“近信至”；酉时，东北“主疾病”，其他与《百怪断经》中《鸦鸣占》所占事项基本一致。基本一致处，也略有差异，《百怪断经》用语略简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，例如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记载寅卯时鸦鸣在正东时，主“人送物至”，《百怪断经》仅云“送物”，很难说两者谁抄自谁，但是可以肯定两者出于同一理论，而这种理论和敦煌“乌占习要事法”不同。俞海为宋人，事迹、活动年代待考。另外，元宋鲁珍通书、元何士泰历法、明熊宗立类编《类编历法通书大全》卷三十《杂占门》有“占鸦鸣吉凶方”^②，与二书基本相同，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更加接近，且《类编历法通书大全》不少地方引用《百忌历》，此处“占鸦鸣吉凶方”当抄自《百忌历》。尽管我们尚不能据此肯定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“占鸦鸣经”的形成时代，但是可以推定，它主要流行于宋元。

五、金神七煞与天罡、河魁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有金神七煞，为凶煞，元何士泰《新编历法集成》前集载“金神七煞方”，文曰：“甲、巳年，午、未、申、酉方；乙、庚年，辰、巳方；丁、壬年，寅、卯、戌、亥方；丙、辛年，寅、卯、午、未、子、丑方；戊、癸年，申、酉、子、丑方。□犯杀七人，忌修方。”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诸年凶方同。金神七煞观念起于何时？

文献中金神七煞观念较早见于五代初期，后蜀何光远《鉴诫录》卷九“鉴冤辱”条云：

梁朝彭城王刘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，因筑营墙掘得一物，重八十餘斤，状若油囊，召宾幕、诸将问之，或曰地囊，或曰飞廉，或曰金神七杀。^③这里的金神七煞是重八十餘斤、状若油囊之“物”，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的金神七煞方虽有一定区别，但可说明已经有金神七煞的观念。

敦煌历日中，宋以前历日中无金神七煞之说，敦煌文书 S.0612《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（978）应天具注历日》序中云“金神在申、酉、子、丑四位地，犯之者百事大凶”，正与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相合，也恰是这年的具注历乃“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勘定大本历日”，这说明中原历日此时也有金神所在

①《说郛》卷一百九下引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82册，第335-336页。

②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062册，第682页。

③何光远：《鉴诫录》卷九“鉴冤辱”，知不足斋本，叶五b。

方。敦煌文书 S.1473+S.11427B 背《宋太平兴国七年壬午岁(982)具注历日并序》载“金神七煞在寅、卯、戌、亥四位之地,切需回避即吉”。金神七煞所在方需回避的观念已成为社会共识。可惜的是,唐五代中原王朝历日之序今皆不存,不知金神七煞何时开始出现在历日中。笔者曾经以敦煌、吐鲁番所出历日为中心探讨唐宋葬事选择避忌破、魁、罡、复日的情况,可以确知敦煌的这些避忌一般比中原王朝实行的时间要晚^①,因此,我们推测金神七煞可能是在中晚唐时期才开始出现在历日中,金神七煞观念的流行应在中晚唐。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又有推天罡、河魁日及天罡、河魁时,据考证,天罡、河魁日避忌的流行可能是在唐代宗、德宗年间^②。

六、书目中的《百忌历》

标有“百忌”字样的方术典籍源远流长,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载有“《百忌大历要钞》一卷,《百忌历术》一卷,《百忌通历法》一卷梁有《杂百忌》五卷,亡,《历忌新书》十二卷,《太史百忌历图》一卷梁有《太史百忌》一卷,亡”^③。可惜均无传本,内容不详,难以确定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与它们的关系。

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并非吕才所撰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二载有“《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二卷”,但是陈氏说:“称唐吕才撰。有序。案:才序《阴阳书》,其三篇见于本传,曰《禄命》,曰《卜宅》,曰《葬》,尽扫世俗拘滞之论,安得复有此历?本初固已假托,后人附益,尤不经。”^④我们认为,吕才虽然对以往的阴阳书批评甚多,但是并不妨碍他参编《阴阳书》,所以也就不能仅据此便判断吕才一定没编过《百忌历》。但是陈氏的观点仍然是有价值的。《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不见于著录了吕才所编《阴阳书》的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,而如所周知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依据的是开元年间的《古今书录》,假如吕才真的曾经编过此书,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及《旧唐书·吕才传》不应失载,故而可以推断,唐开元年间此书尚未问世。目前所知,该书较早被《崇文总目》著录^⑤,结合黄正建先生所揭《十国春秋》五代时李戴仁已查阅《百忌历》,则载于《崇文总目》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中的所谓吕才撰《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当为晚唐五代旧籍,并非吕才所撰,亦非宋人假托。有一条材料可以说明日藏本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确实保存了晚唐五代流行的《百忌历》中的一些内容。《十国春秋》所载李戴仁事实为已经佚失的《荆南近事》之文,《海录碎事》卷七上引其文曰:

①吴羽:《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——以敦煌、吐鲁番出土历日为中心》,复旦大学主办,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“第六届‘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’”会议论文,2012年8月。

②吴羽:《唐宋葬事择吉避忌的若干变化——以敦煌、吐鲁番出土历日为中心》。

③《隋书》卷三十四,中华书局,1973年,第1035页。

④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,第370页。

⑤《崇文总目》卷四,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,上海商务印书馆,1937年,第250页。

李戴仁与妻阎氏异室,约曰:“有兴则见。”一夕,阎扣户欲见,戴仁取《百忌历》,灯下看之,大惊曰:“今夜河魁在房,岂可行事?”语小竖曰:“传语县君:谢到。”^①

而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恰有“推天罡、河魁时”。

不过,晚唐至两宋流行的《百忌历》,其内容却并非一成不变。从卷数来讲,《崇文总目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载《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均为一卷,《宋史·艺文志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二则云二卷。从内容上看,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并无一以贯之的理论,而是对各种理论的杂凑,例如《万通历》具有明显的排他性,认为只要按照《万通历》即可,不必再避忌其他凶日,可是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又记载了其他所要避忌的各种理论,例如行年灾厄、长短星等,既然是流行理论的拼凑之作,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、流行理论的变化而增删内容,宋王观国《学林》卷五“五姓”云:

世又有《广济百忌历》,所载一举措,无不惟五姓音征是从,盖此书乃日者哀聚诸家阴阳之说,务欲部秩厚大,而鬻书籍之家,赖以得利多。其书假吕才之名,而猥酿泛杂,不足取信,世俗多为此书所误。^②

有材料表明,王观国所言非虚,范成大《骞鸾录》有云:“(乾道九年正月)十日,泊婺州。十一日早饭马海寺,世俗所用《百忌历》,出此寺。”^③确有人贩卖《百忌历》获利。一方面,日者“务欲部秩厚大”,说明当时人不断将一些内容加进《百忌历》;另一方面,王观国所云“五姓”的相关说法,在日藏本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毫不重要,说明日藏本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仅是残卷或节本,原《百忌历》本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遗失。

综上所述,我们认为流行于晚唐五代两宋的《百忌历》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,日藏本《新雕广济阴阳百忌历》中确有不少内容是晚唐、五代、宋的观念,但是也有宋代才流行的学说,例如其中的“赤口杀”之说及《占鸦鸣经》,所以其成书年代当在北宋或稍晚,并非吕才之作,且仅是残本。至于其何时被东传日本,则尚待研究。即使其成书年代在宋或稍晚,也丝毫不影响其重要的研究价值,因为在晚唐至宋民间广泛流行,对宋、元、明通书具有重要影响的《百忌历》,只有借此才能稍见端倪,故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。

附记:本文的写作得到酒井规史博士的无私帮助,在此谨致谢忱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

①叶廷珪撰:《海录碎事》卷七上《夫妇门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267页。

②王观国:《学林》,中华书局,1988年,第174页。

③范成大:《骞鸾录》,《范成大笔记六种》,中华书局,2002年,第46页。